

“做功利上不讨好、学术上意义大的事”

——对话南炳文

书房主人：

南开大学资深教授南炳文，1942年1月生，河北广宗人。中国明史学会前会长，现任中国明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天津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及故宫博物院客座研究员，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承担、主持“二十四史”点校本之《明史》修订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研究》工程等基础性资料建设工作。著有《明史》(合著)、《南明史》《明史新探》《明代文化研究》(合著)、《清代文化》(合著)、《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等论著30余种。

南炳文的书房

南炳文的书房就是他理首历史研究的办公室，一处位于南开大学范孙楼内，另一处，也是他现在主要使用的书房，位于廊坊师范学院的图书馆一层最内侧。

屋中布置简单，几个办公柜，几张办公桌。桌上布满高高摆起的各类工具书，各种字典、词典和历史典籍。南炳文工作用的桌子面朝南，对着半掩窗帘的窗户，阳光每天随时间在桌子上移动，南炳文和他那把最常见的黑色折叠椅也随之挪动，躲到太阳晒不到的位置。

校领导几次提出要为他更换桌椅摆设，他回回都拒绝，说自己现在就很好，“乱中有序”，他开玩笑说自己的两个书房是一个风格，“乱七八糟”。

“我这条件够好的，用书很方便，常用的书在这边，另一部分在对面。”对面房间是他的学术助理王雅洁的办公室，里面像图书馆，几排书架上摆着3000多册的“文渊阁”及“续修”《四库全书》(其他《四库全书》在另外书房存放)和几种大部头的地方志。

有排书架从上到下摆着一沓沓已完成修订的点校本《明史》清样打印稿，十余年修史光阴凝聚其中。

南炳文书房中的所有书籍，无一例外与其修史校勘工作相关，包括《褚遂良书法精选》也并非用以欣赏书法，而是帮助对照辨认清明时期手抄本中难以辨识的草书。



崔岱远

要想在京城里找到老书铺的影子，那就得从和平门奔南，沿着南新华街路东走不远，您就能钻进号称是京城最长的书店——由一连串书铺组成的“中国书店”了。这些店铺门脸都不太大，说不上华贵，可也并不寒碜，带着那么点儿旧皇城的老气派。别看这溜店铺进深不深，而且宽窄窄窄，可您沿着那一眼望不到头的书架子往前走，把生涩的文字讲得无比通俗，读得我如醉如痴、爱不释手，看了看价钱，咬咬牙决定买下来。可一摸兜儿，发现竟然没带那么些钱。怎么办？灵机一动，把它卷起来偷偷塞在大书柜的角落缝隙后面。过了两天，带够了钱特意再来买，伸手一掏，那本安静地躲在那儿……直到今天，它还藏在我的书柜里。

“淘书”之乐

所谓“淘书”并不是简单地买书。淘书的乐趣在于，像淘米一样以平和舒缓的心态从浩如烟海的旧书黄卷堆里遴选出自己得意的珍品，甚至只是那几片发黄的残页，淘书者有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苦觅，可有时又是并无直接目标的邂逅。或欣慰、或惊艳、或惋惜、或怅然，千般情感就产生于手指与微黄纸张那轻轻一碰触之间。

对于爱书者而言，淘书的过程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其间体味到的那种不期而遇的快感简直让人上瘾，而提供了这种独特享受的古旧书店自然也就成了书迷的精神憩园。记得有一回我在书架上偶然翻到了一本讲解《诗经》的旧书，把生涩的文字讲得无比通俗，读得我如醉如痴、爱不释手，看了看价钱，咬咬牙决定买下来。可一摸兜儿，发现竟然没带那么些钱。怎么办？灵机一动，把它卷起来偷偷塞在大书柜的角落缝隙后面。过了两天，带够了钱特意再来买，伸手一掏，那本安静地躲在那儿……直到今天，它还藏在我的书柜里。很多人以为中国书店是家百十年来的老字号，不仅因为这浑雅的名号，更因为一走进中国书店就仿佛穿越回古代的书肆，整个人也一下子舒缓下来，不由得慢条斯理翻弄起那些夹着纸签的

本报记者王京雪

治学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书房是您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您在这里的一天通常如何度过？

南炳文：我比较规律，一般6点半到7点起床，8点10分左右到这儿开工，干到中午11点40分，闹钟响了。正常的话，12点到家，吃完饭午休5到10分钟，我是躺下就能睡着那种人。这样下午1点来钟回到这里接着干。下午6点40分，闹钟一响，争取7点到7点半回家，晚上处理可以在家做的事，比如写个信之类。处理完，11点多睡觉。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重大项目《明实录整理与修订》，基本就在这间屋子里做，因为这边用书方便。《明实录》1600多万字，是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就像大事记一样，校勘必须要看更多原始资料，没书的话寸步难行。

草地：您的读书经历和最终选择明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缘起是怎样的？

南炳文：我爱读书很早，小时候就看了《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各种小说。我爸爸是兽医，希望我将来也当兽医，有个谋生之道，就让我读些《元亨疗马集》一类的医典，但我真不感兴趣，自己在屋子里，有大人进来了，才赶快抓起来看两眼。

1961年我参加高考，报考了南开大学历史系。那时，我对历史这门学问还不很了解。南开有一批著名历史学家，在那样的学术氛围中，我很快发现历史跟中学时的死记硬背很不一样，你要做研究，要创新，那我创什么新？

得知明清史是南开最有优势的学科，明清史研究室是南开甚至全国明清史研究的高地，领导该研究机构的郑天挺先生又是史学界最有成就的权威学者之一，让我对从事明清史研究产生了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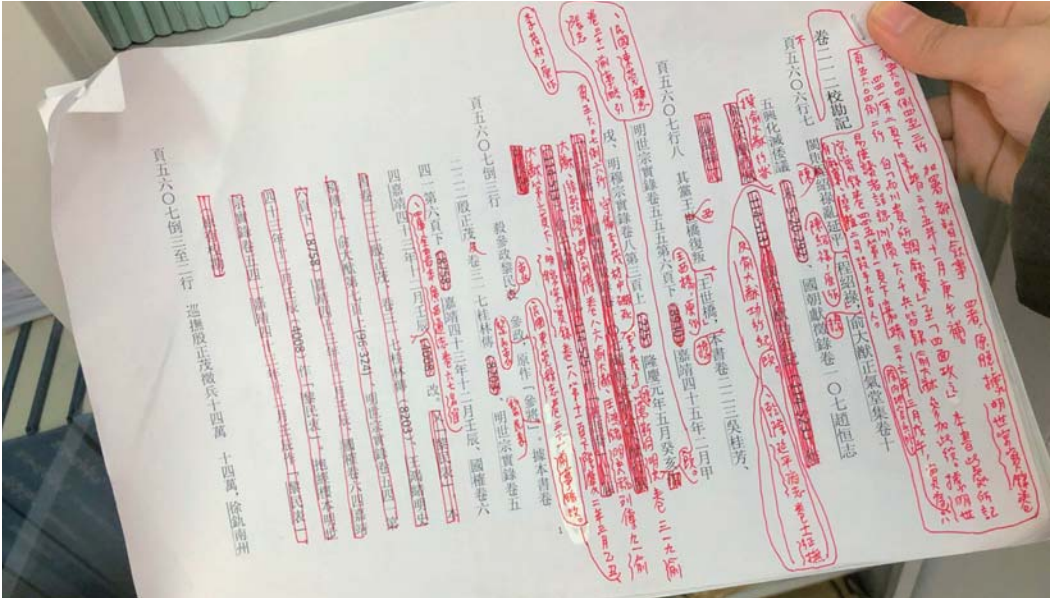
1962年，我大二时，听老师王文郁说，清史方面已经有萧一山的《清代通史》，而明史方面还没有今人大部头章节体断代史专著，于是，我立下志向，要填补这个空白，写一部大部头的断代史明史，从此开始整天读明史相关的书籍，这是影响我一生的事情。

草地：萧一山写《清代通史》也是因为中学时读到日本史学家的清史著作，认为国人应该自己研究中国史，从此以写清史为目标，上大学后废寝忘食苦读，与您20岁立志写明史的经历有点相似。

南炳文：不太一样，我不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而是决定在明史清史中选一个方向写书时，发现清朝已经有人写过了，于是就决定做明史。

定下目标后，我立刻开始阅读有关著作，要求自己门门功课之余，所有时间都用在看明史上。还买了张中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剪下来，读书时，读到哪个省，就把对应那片拿出来。学历史，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地理概念，是最基本的，必须弄清楚。所以我当时读书必带地图，再必备两大本《辞源》，遇到不懂的字，立刻就查，再背几本《明史纪事本末》细读。你看，我现在手边也常放着《二十史朔闰表》，这个是用来推算时间的工具书。

遇到天文、地理、时间等各种问题，都立刻去查去解决，必须想办法弄明白，治学，如果有没弄



▲南炳文经手过的书稿。

清楚的地方，就无法连贯。遇到问题，不求甚解，就不能很好地把握那段历史。

草地：那么年轻就立下宏志，听说您当时也是废寝忘食，以刻苦闻名，吃完饭被问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并且一直坚持这样苦读，不会感到疲倦吗？

南炳文：一般都感觉不到，就是一种求知欲，在那儿引着你，你就放不下书，一个问题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你就放不下。这个地名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物究竟怎么样？这里涉及的词是不是有典故？一定要查清楚了才放得下。

“史籍整理，在功利上不讨好，但学术上意义极大”

草地：1979年，您得到了撰写大部头断代史明史的机会，完成这一大学时立下的目标后，您的学术方向转移到史籍的点校整理上，这一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南炳文：对，当时受出版社邀约和汤纲先生合作撰写《明史》，1985年出版了上册，1991年出版下册，另外我写的南明部分，又另行出版了《南明史》。

做完《明史》后，我一直在思考接下来做什么，有两个方向可选择：一是聚焦比如法律、经济这样的某一个方面，沿一条线深入做下去；还有一个是为史学研究做些更基础的原始材料整理工作。我感到做某一方面的明史研究，也是贡献，但**做基础性的史籍文献整理贡献更大**，可以给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提供基础，供千万人使用。

于是我开始对一些大部头的基础性文献进行整理校勘和修订，用10余年时间将存于国内外的《万历起居注》残本进行辑校补正，基本恢复其原貌，又对仅存于日本的《泰昌起居注》《天启起居注》进行校勘整理引进。

2007年，我主持了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的修订。2013年底，又开始了《明实录》的校勘与研究工作。

草地：在高校学术评价制度里，比起史籍整理，更看重专著和论文，包括您整理《万历起居注》时，听说也受过劝告，说从经济效益上说，不如只原样影印，不必耗费精力去校勘整理。您有没有担忧过背些冷板凳的人少了？

京城一缕书香远

对于爱书者而言，淘书的过程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所谓“淘书”并不是简单地买书。淘书的乐趣在于，像淘米一样以平和舒缓的心态从浩如烟海的旧书黄卷堆里遴选出自己得意的珍品，甚至只是那几片发黄的残页

淘书者有时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苦觅，可有时又是并无直接目标的邂逅。或欣慰、或惊艳、或惋惜、或怅然，千般情感就产生于手指与微黄纸张那轻轻一碰触之间

的书肆了。

乾隆年间，朝廷编修《四库全书》，纪晓岚等编纂人员往往是下班之后直奔琉璃厂仔仔细细地淘书，搜罗校阅某卷文献需要考据的典籍善本。从此，那一间间小书铺不经意地演变成文人安身立命的宝地，而逛书铺、淘老书也成了京城读书人特有的生活方式。

对于读书人，逛书铺是一桩充满情调的雅事，这家走走，那家串串，一天下来绝不会烦。因为这几十家店的藏书风格不尽相同，有的偏重音韵、训诂；有的专收金石拓片；还有的是从外省购进的珂罗版典籍。尽管大多数老书铺并没有气派的门面，也缺少奢华的摆设，然而却都充盈着浓浓的文化气息。

未进门时，您抬头就先到古朴的牌匾，或叫某某阁、或称某某斋、或题某某堂，名号雅韵悠扬，而且不乏名家笔墨。兴许一家不起眼的小书棚就能挂着翁同龢或梁启超的真迹。店家这么做当然有炫耀的意味，不过也恰恰说明了这个行当和文化名流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

撩开大门帘子，推开那两扇有些褪色的黑漆木门进到店里，顿时感受到一股温良淳厚的气氛，就像透过老式窗棂上的玻璃洒在条案上的那缕淡淡的柔光，并不耀眼，却让人觉得格外舒坦。店里无论是掌柜的还是伙计对顾客永远是那么恭敬谦和，永远微微弓着身子用极柔润的语调轻声和您打着招呼：“先生来啦！这套《乐府诗集》替您收着呢。您先留着看？”“哟！先生您真福气，这套嘉靖刻本可是从大宅门里流出的。我匀给您？”尽管他们做的是买卖，但却特意回避说出“买、卖”二字。他

们非常了解自己的顾客，在读书人心里，书是珍贵的，书铺当然也不是在经营普通的商品，而必须浸润着厚实的文化积淀和独特的人文情调。

“为书找人，为人找书”

这路买卖的独到之处，表面上是对作为衣食父母的读书人的尊重，骨子里却是对学问的景仰之情。书铺的伙计别看并没有太深的学问，但他们可以做到顾客来上一两趟就知道您是研究哪路学问的，您可能需要些什么书。等到您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把您喜欢的书和想找的书全都预备好了，有时甚至比您想得还要全。因为他们背熟了张之洞的《书目问答》，再加上十几年在书堆里的历练，对于各种版本乃至行款特征已经了然于心了。读书人对这么用心的伙计自然也多了几分敬重，所以并不喊他们做伙计或店员，而是亲切地称为“书友”。

书友与文人之间因书而结缘，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交情的故事比比皆是，这也就让古旧书行一直延续了送书上门的传统。当他们搜罗到一套某位学者感兴趣的善本时，会赶紧用包袱皮一裹送到人家府上：“这套先放您这儿，您留着看。要是不喜欢您言语，赶明儿我再取回去。”可谁又忍心让殷勤周到的书友大老远白跑一趟不是？买卖就这么做成了。

这种充满着书香的人情味儿一直保持到我上中学时候的中国书店，那时几位老师傅依然会蹬着自行车从琉璃厂跑到西郊的高校去送

“读的人也许不多，但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您似乎与网络技术保持着距离？网上曾有学生想发邮件向您请教问题，有人答复说您深居简出，很少用电脑，不如直接写信。您也很少用微信。

南炳文：是的，我手机能接打电话，能看短信，但不会回，微信也不懂，学生们搞了微信群，我也没加。其实很简单的事，但我不去学，学了就干不了活了。这一二十年来，我主持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工程，需要把所有精力用上，从这个角度，我希望减少一些打扰。因为网络太方便，也太随便了，咱！一条，咱！又来一条，你说你回不回？总要处理这些，自己的事也就耽误了。现在，我有了学术助手，她会为我处理电子邮件等事务。

网络的便捷是件有利有弊的事，过去你被逼着在脑子里装很多东西，知道什么问题找哪本书，在什么地方下力气，久而久之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现在电脑检索方便了，但你没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网上能查出来的，只有已知的和部分搬上网络的东西，很多没被解决的问题网上也查不到，而且网上的东西准确率是要打问号的。我当然不排斥现代技术，要充分利用好现代化的手段，但也要靠读书积累、独立思考，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两套功夫。这两套功夫如果能很好地结合使用可能是最好的。

草地：现在网上活跃着许多分类细致、热情高涨的历史爱好者群体，这种网络时代的热潮有积极一面，但人们也时常看到以讹传讹的信息广泛传播，从专业的历史学者的角度，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南炳文：我不太在意这些，别太认真就是了。许多以历史面目出现的东西并不是历史，而是说书。历史学者也有理解的深浅区别，有负责和不负责任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在电视上和网上，说得有趣、有具体情节的比较容易有观众，这是一种社会需要，但实际上历史不可能把有趣的信息都记下来，有些有趣的事情也不便于记下来。我看到的错误太多了，**做严肃历史的，就做严肃历史的事，做群众娱乐的就做群众娱乐**。当然，做严肃历史的，对于歪曲历史的现象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用一些时间加以纠正。

草地：作为严肃历史学者，不会想出来澄清一些错误吗？

南炳文：你不可能整天去纠错，那没完没了，还是要抓住自己最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任务。我觉得去澄清这些不是我的主要任务。我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手头这些史籍中的错误改过来，**我的乐趣在于把它改正确，让以后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有个依据，永久留下一个比较正确的本子**，让人们不再以讹传讹。

我没想过我整理的书会有多少公众感兴趣，这些书的主要读者其实是几类人：搞历史的人，要从历史中总结真正经验的大理论家和大政治家。人不多，但时间久远，它们永远有人关照。

草地：研究了大半生明史，这段历史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南炳文：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维持近300年的稳定是很不容易的，这一时期在治理国家等各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成为经验的东西，例如，对官僚队伍的分工和安排方面。过去因为种种原因，对明朝骂得多，肯定得少，我认为应该更充分地研究这段历史。

书，然后带着书单回来为他的教授朋友四处寻书。其实，也没谁要求老师傅们这么干，只不过是这几十年来“为书找人，为人找书”已然成了他们的生活习惯。

说到找书那可是件有意思的事儿。等着送货上门的坐收要算是最基本的方式，看似简单，也还真等来过明版古书。走街串巷是这一行的传统，直到上世纪80年代，收购员还能一年两百多次在各地搜罗散落散失于民间的古籍。从废品收购站、郊区的灶膛前，甚至从造纸厂的化粪池边抢救下珍贵版本的例子不在少数。

当然，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些传统的找书方式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入大户。清末民初，很多丢了铁杆庄稼的旗人败了家，于是纷纷变卖家产。变卖家产也是有顺序的，最先卖的通常就是书，然后才是字画、古玩，最后连卖了才会卖房。还有的人家，老人原本是喜欢书的。老人过世，那些不成器的子孙们赶紧忙着分家，对于纨绔子弟来说，最没用的当然是书，不如把它变成钱分了。这些人一辈子的藏书经常能有一屋子，甚至一座藏书楼。

古旧书铺怎么能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于是赶紧上门入户，以很便宜的价格整车拉回来，然后再认真遴选。他们不会看走眼，因为见得太多了，哪本书多少函、多少册，每页多少行、多少字，刊刻特点及版本源流都烂熟于心。真正的好货色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不错，作为商人他们练就这身功夫是为了赚钱，可却不自觉地担当起文化的守护神。

有意思的是，老书铺改造成中国书店之后，那一间间小书铺子的格局被打通串联起来，形成了一个堪称是京城最长的书店，足有公交车一站地那么远。那条摆满了各种书籍的长廊曾经令多少读书人流连忘返！直到上个世纪末，徜徉于此淘书依然是北京书迷的一大乐事，这个习惯感染过我，直到今天。

而今，爱好古旧书的人尽管没那么多了，但那一缕悠远的书香依然萦绕着离高楼大厦咫尺之遥的那一排小书店。在那儿，依然有一群爱书的老师傅们传承着我们民族智慧古老的牌记，默默地守望着那块读书人心目中的圣地。